



“不要叫我省长,叫我颂公!”

1963年早春时节,一天清晨,我正在长沙县合兴生产队队部门前书写黑板报,听到身后有人轻轻说:“啊,这内容还不错,有时事政治,还有农技知识,好,好!”我回头一看,见是一位长者正笑嘻嘻地读着我刚写完的黑板报。

这几天,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,率领王延春、李瑞山、华国锋、苏钢等省委主要领导及程潜老省长,都住到我们村里来了,张平化书记还住进了我家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们是继1962年党中央的七千人大会后,响应毛泽东主席、党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,住进我们村的。为何选在我们村?因为那时我们长沙县春华公社武塘大队,曾经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地方。1955年,毛主席为武塘农业合作社整顿办社经验,写下了长达1700多字的按语《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优势》。这是毛主席所写批示按语中最长的一篇。

我从报纸的照片上,早就认识了省委书记、省长,于是赶紧打招呼:“哦,老省长,您好您好!”程潜笑呵呵地说:“不要叫我省长,叫我颂公(程潜,字颂云)!”此后四年,我一直称呼他颂公。

当时在我们村,叫平化书记只能叫张大爷(他在老家兄弟中排行老大),叫程潜省长则只能叫颂公。我听程潜说过:这样叫,多自然,多亲切!

那年程潜82岁,我16岁,

程潜蹲点春华公社

比他孙子还小。以后交往多了,程潜蛮喜欢我,笑着说:“我们就做个忘年交吧!”

“我程潜何德何能,能让主席这般厚爱”

来春华公社后,张平化就向程潜建议:“颂公,我们在这春华公社是不是可以办一所红专夜校?利用晚上和农闲时间上课,一周两次,对象主要是基层干部、青年农民,让他们学文化,学政治,重点学先进的农业技术。”程潜眼睛一亮:“好事哟,好事!”

红专夜校举行开学典礼后,张平化提议:请颂公上第一课。程潜又欣然答应。

红专夜校就设在春华老街的公社文化站里。那天,在社员住户家早早吃过晚饭后,程潜就喊我一起走。他坚持不要车送,而是让我陪他慢慢步行。听说他要去看恒丰楼,我赶紧给公社主任打了电话,让他做好准备。

从我们这到春华老街,有近两华里的路程,走在飘溢着稻香的田垄上,程潜心情格外轻松。当走进春华那条麻石老街时,早在那迎候的公社主任,忙引着他走向恒丰楼。这是程潜第一次登临恒丰楼。主任告诉他:这座楼就是当年签订长沙和平解放条约的地方。程潜分外兴奋,从楼下到楼上,前前后后到处看……他高兴地说:“这地方我晓得。那是1949年8月3日,签条约

那天我没来,特派了程星龄、罗文浪他们来的。和解放军代表在这里一签约,长沙第二天就宣告和平解放。这地方好,真好,有历史纪念意义。”他还再三嘱咐一旁的公社主任:一定要好好保护恒丰楼。

看完恒丰楼后,程潜就去红专夜校上课。那晚听说是程潜来上第一课,全公社的基层干部都来了。周围好多农民,拿着手电筒,也自发地来了。一反往常的柔声细语,声音洪亮,中气十足地讲了将近两个小时。他详细回忆了长沙、湖南和平解放过程中的亲身经历。他深情地说:解放前,我主政湖南,是湖南省政府主席。湖南和平解放后,毛主席一再给我做工作,要我仍然担任湖南省省长。毛主席还派和我一道起义的陈明仁将军,

去镇守海南,任驻军司令。海南,那可是面对台湾,面对蒋介石的最前线呀!由此看出,党中央和毛主席,对我们这些起义投诚的将领,是多么地放心,是多么地看重,又是多么地信任啊……

“我来想想办法吧”

我那时已担任春华公社



▲1952年9月,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为程潜(中)划船

文化站站长,程潜看到文化站图书架上只摆着几十本小书时,叹了口气说:“我来想想办法吧。”几天后,他竟为我们文化站送来一大卡车书籍,有几万册。我惊问:“颂公,怎么这么多啰?”程潜呵呵笑道:“我在省政府机关一动员,号召每人捐两本书,多多益善。这不,一下就捐了这么多。”程潜的秘书补充说:“省长回家清了一天,他把自家3000册藏书,也全部捐献了呢。”

程潜还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。那时,张平化等省领导经常下田垄插田、扮禾,程潜也想去。看到程潜年岁已高,身体又不好,平化书记总劝他不要去,让他在抛砖屋场休息,没事就看看书,看看报。待他们走后,程潜喊上我,说一起去田垄铲草皮。犟他不过,我只能陪着他去。铲草皮,劳动轻松一点,但程潜有严重的哮喘病,铲一会儿,就要撑着锄头,大口大口地喘气。他毕竟80多岁了,看着都让人心疼。我恳求他回去休息,他不肯,硬要看到平化书记他们收工了,才肯回来。

(摘自《文史博览》辛资超/文)

宋代如何治理“豆腐渣工程”

标准,负责工程质量监管的部门可依照《营造法式》的标准,对公共工程质量进行验收。

“保质期”制度

朝廷还对公共工程实行“保质期”制度,即工程完工、投入使用后,在若干年限内有质量问题,则追究设计方、施工方与监修者的刑事责任。这个“保质期”一般是5年,重要的工程是8年。

宋仁宗天圣年间,朝廷听闻各地“修盖舍屋”“多不牢固”,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对工程质量的检测,“添差监官点检,须要牢固”,并重申:房屋、桥梁等公共工程,如果在完工后一年内发生垫陷,负责该工程的设计者与工头,将被处以杖一百的刑罚;如果是二年内发生垫陷,刑罚减一等;以此类推,直至满五年。监修者受

到的责罚比设计方、施工方又减一等。这些罪罚不得赦免,即使相关责任人已调离原职位,也不得免于追究。

若发生倒塌之类的严重事故,问责不受保质期之限,惩罚也会更加严厉。宋真宗时,因“天雄军修城不谨,战棚圯”,一名叫贾继勋的官员被开除公职,流放汝州;还有两名官员被削职,发配许州、滑州服役。

“物勒工名”

“物勒工名”,是指国家强制工匠在他们制造的器物上刻上自己的名字,一旦发现产品的质量问題,即按名字追溯制造者的责任。据说早在春秋时已经有了“物勒工名”的制度。《吕氏春秋》载:“物勒工名,以考其诚。工有不当,必行其罪,以穷以情。”宋景德

三年(1006年)六月,由于“京中靡宇营造频多,匠人因为奸利,其频有完葺,以故全不用心,未久复以损坏”,宋真宗下诏:“自今明行条约,凡有兴作,皆须用功尽料。仍令随处志其修葺年月、使臣工匠姓名,委省司覆验。”现在,越来越多的建筑工程也开始标明设计方与承建方的名称,这既是国际通行惯例,也算是对“物勒工名”传统的继承。

在宋代,“物勒工名”这一传统还逐渐演化成“商标”。“物勒工名,以考其诚”开始只是强制性的责任认定,但在演进过程中,它使一部分优秀工匠的名字脱颖而出,成为获得广泛信任的品牌。当品牌形成后,工匠一改被动的“物勒工名”,而主动在自己制造的产品上留下独有的标志,以便和同类产品区分,于是便产生了“商标”。(摘自《老人报》一名/文)

南北朝至隋朝的时候,有一位士大夫叫颜之推,他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。他出生于南方的梁朝。年轻时的颜之推,可以说是目睹了南朝最为繁华的时光。随着“侯景之乱”的爆发,南朝繁华付诸东流,之后不久,梁朝也灭亡了。征服者是来自北方关中地区的西魏政权,颜之推做了西魏军队的俘虏。

有趣的是,短短两年之后,西魏也灭亡了,被一个叫北周的政权取代。颜之推趁此机会逃离,历经千辛万苦,最终落脚在华北平原的北齐政权。颜之推在北齐大概过了二十年的安稳日子。随后,北齐又被北周灭亡,颜之推再度做了亡国奴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,戏剧性的场面再次

“够得着”

王志纲老师早年是新华社的记者。有一次,他跟我聊起曾在贵州龙场悟道的王阳明。龙场在贵州修文县,而王志纲的老家在隔壁县。

王志纲说,王阳明对他的影响,其实不仅在于其“心学”理论,更在于3个字——够得着。

对一个生活在贵州山里的孩子来说,北京、上海太远,够不着。他无法想象自己能在那样的大城市里有什么建树。但当他发现大名鼎鼎的王阳明曾在隔壁县待过,最重要的悟道时刻也发生在那里时,一切就不一样了。

王志纲说,他这辈子做事的底气,就来自500多年前的王阳明。“我跟他吃同样的饭,喝同样的水,在同样的边陲,忍受同样的瘴疠之气。我读他的书,看到他能取得那么高的成就,我又有什么不能的呢?我‘够得着’啊。”“够得着”这3个字太奇妙了。

在中国,那么长的历史里,哪城哪地没有出过几位名人?只要肯阅读,谁都不缺自己“够得着”的人格楷模。

我出生在安徽芜湖,这是长三角的一个三线城市。我也有“够得着”的人。比如,如果要当文人,我知道我“够得着”汤显祖。他当年在芜湖写过《牡丹亭》,因此,我会去看他的文集。

苏轼曾经被贬官到海南,从此终结了海南没有进士的历史。海南在宋代出了



13个进士。第一个进士就是苏轼在当地教的学生。

有人可能会说,这是苏轼在当地教书育人的结果。但苏轼在海南前前后后也就待了3年时间,仅凭教育,哪里能有这么立竿见影的效果?

也许,仍然是因为“够得着”。海南原来的读书人,隔着茫茫海峽,远眺东京汴梁,感觉山长水远。此地从来没有出过进士,凭什么我就能考中呢?而苏轼一来,读书人一看,哦,这么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家,原来就是苏轼啊。他在给我们讲书时亲口说过,我们不比其他地方的读书人差啊。信心一立,海南就开始出进士了,而且文脉再无中断。

今天,在海南备战高考的学生,如果了解了这段历史,翻开苏轼的诗文集,看到的怎么会仅仅是诗文?其中一定还有前辈乡贤的加持啊。

文化传播,不只是知识从这里被拷贝到那里的过程,还是一根根人格火炬彼此点燃、薪尽火传的过程。这样的人走到哪里,就点化哪里,那里的人就“够得着”那架登天之梯。即使只是让当地人做了一个虚幻的梦,梦醒之后,他们也永远不是原来的自己了。

历史隐藏着未来

上演,短短四年之后,刚统一北方的北周政权也灭亡了。隋文帝杨坚即位,开始了隋朝的统治历程。

这样复杂的人生经历,让颜之推看到了很多常人看不到的东西,于是他将乱世中的感悟写成一本名叫《颜氏家训》的书,希望这些经验教训能帮助他的子子孙孙洞明世事,健康成长。

《颜氏家训》里有这样一个故事。颜之推生活在北齐的时候,有一位士大夫对他,我有一个儿子,今年十七岁了,学习还不错;我还想让他学习鲜卑语,弹弹琵琶。为什么要学这些呢?因为当时

北齐最高的统治阶层是鲜卑贵族,说的是鲜卑语,而且北齐皇帝很喜欢琵琶。这位士大夫的意思是:年轻人要有出息,不仅要学习好,还要学会讨好皇帝和达官贵人的技巧。说鲜卑语、弹琵琶,就是为接近、服侍达官贵人而投其所好。

颜之推把这件事记录在《颜氏家训》里,感叹道,这人怎么会这样教育孩子呢?他告诫自己的后代,千万不要这样做。靠服侍人捧出位,首先独立人格没有了,更何况把这些达官贵人伺候得再好也未必就能当大官呢。

那么,这位士大夫和颜之推的分歧,关键在哪里?

这位士大夫认为,讨好眼前的贵人,自己就有机会飞黄腾达——这是很多人都容易有的想法。颜之推却质疑说:你眼前的贵人,将来会一直是贵人吗?你为了讨好他,甚至连独立的人格都不要了,万一有一天他被打翻在地,成为阶下囚,先不说你会不会受连累,你曾经的付出在那个时候还有什么价值呢?还能得到什么回报呢?

这位士大夫扭曲的教育理念,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批评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:只顾眼前,忽视了未来的复杂性。这种思想,看上去是对未

田螺稳死窟

明代的《增广贤文》里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谚语:“树挪死,人挪活。”意思是树挪动位置会伤根伤叶,容易死亡。而人恰恰相反,要学会适应各种环境才会有更好的发展,如果和树一样永远固守一处,那可能不会有太大出息。在我们的客家话里,也有一句与其意思相近的俗语——“田螺稳死窟”,它常常用来告诉人们不能像田螺那样固守一处,安于现状,要学会变通,改变一成不变的状态,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可能。

有一个有趣的谜语:“生的是碗,煮熟是一碗。不吃是一碗,吃了也一碗。”谜底正是田螺。

话说“太阳下山,田螺摆摊”,道出了田螺这种软体动物的一大特点:喜欢阴凉。所以夜间才是捉田螺的最佳时间。田螺带壳,遇到危险情况时,就把身体缩进壳里。事实

来缺乏前瞻,但它的重要根源之一其实是对历史缺乏洞察。如果把时间画成一条线,以现在所处的时间为原点,在它左边,是已经发生的事,是历史;在它右边,是尚未发生的事,是未来。历史和未来是对称的。你对历史的理解有多深,对未来的判断就有多敏锐。

颜之推看到过太多昨日尚且风光无限,今日却沦为阶下囚的凄惨人生。将这些丰富的人生经验升华成对历史的深刻反思,再把眼光投向未来,颜之推比常人有了更为睿智的判断。既然富贵不可常保,那焉知你今日所服侍的贵人不是明日的阶下囚呢?

颜之推的预判非常准确。如前所述,北齐政权并不长久。北齐沦亡之时,仅靠服侍北齐贵人而求显达的人,又有何计可施呢?人若是不幸遭遇乱世,固然很难抗拒滚滚历史大潮席卷之下的命运,但无论何时,人都可以选择是否独立自主,做真正的自己。即便无法改变流离的命运,也要把人生掌握在自己手里,千万不要轻易把未来寄托给他人,不仅仅因为这样做过于卑微,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,这样做的风险也很高。

颜之推的睿智,来自对历史的总结。学历史,历史中隐藏着未来。

(摘自《领导文萃》姜鹏/文)

田螺稳死窟

上,田螺的身体大部分时间都是缩在壳内的,只有天气暖和或出来觅食时,才把身体露出。除此之外,它们也常常只待在一个窟窿里,可以说非常“安分”。因田螺喜欢永远待在一个窟窿里,遇上干旱或其他不利情况时,可能就会死掉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在小溪或鱼塘边上,看到只剩下空壳的田螺,这就是“田螺稳死窟”的道理。于是,我们便把喜欢固守同一个地方、不懂变通和适应新环境的人形容为“田螺稳死窟”,这样的比喻非常形象贴切、诙谐有趣。

顺便说一下,客家话里还有其他关于田螺的俗语也很有趣,比如“三只手指捡田螺——十拿九稳”,用来比喻对某些事情非常有把握;“狐狸唔知尾下臭,田螺唔知尾下皱”,比喻没有自知之明,等等。

小小田螺,美味,有趣。(摘自《意林》刘礼达/文)